

第一章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 成就、挑战与未完成的任务

Jane Golley 宋立刚

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转型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社会变革之一。仅仅经过 30 年的时间，中国已经成功地使自己由一个中央计划体制、封闭的经济体转变成成为融入世界市场的、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制度改革中所释放出的活力，极大地释放了企业家的创业能量，并推动了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生产力提高以及贸易和收入的增长，而且这种提高和增长是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进行的。在此期间，中国的 GDP、工业产出、外贸，以及更为重要的平均资本收益分别相应增长了 16 倍、27 倍、123 倍以及 12 倍^①。这种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国内的贫困人口的范围和贫困程度大幅度缩减。世界银行 2009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 1981 ~ 2004 年间，中国以当今的购买力计算的每日可支配收入低于 1 美元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 65% 下降为 10%，而且有近 5 亿人口脱离了贫困。中国的成就对削减世界上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作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得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如此之多也是史无前例的”（世界银行，2009）^②。

截至目前，大多数研究中国的观察家们对于中国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的关键原因也是比较熟悉的。以市场为导向、以价格体系改革为核心的变革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数据计算得出。

② “新千年贫困削减计划”（The Millennium Poverty Reduction Target）的目标是到 2015 年，将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下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削减为 1990 年的比例的一半。

直接提高了资源分配效率，也使得最具有活力的私人部门开始繁荣起来，并由此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的总体效率。以中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为基础，一系列自由化进程导致了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繁荣，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收益。而中央集权程度的降低以及所有制改革又解决了经济中的激励问题，提高了企业和政府绩效。进一步的制度变革抛弃了几十年来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各项限制，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中国城镇中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低于 20% 上升至 2009 年的 46%。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还碰巧遇上了中国的工作适龄人口的爆发式增长，由此产生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而且 Cai 和 Wang 2005 年的研究表明，1982 ~ 2000 年间的单位资本 GDP 的增长的约 1/4 由“人口红利”因素贡献。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显著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状况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近 30 年里，一些有利的内、外部条件和因素也使得中国受益匪浅。从内部来讲，有一些遗传自计划经济体制的因素是有利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其中包括一个基本的工业基础、合理的基础设施、农业灌溉系统以及相对来说发展良好的教育体系。而“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国内有了巨大的要求变革的力量，这有助于克服那些拒绝改变的保守力量的限制，在改革的初期尤其如此。中国经济发展的低起点又使得中国经济享有了生产上的低成本优势，这一点极大地促进了产出的增长和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此外，作为经济发展的后来者，中国还具有后发优势，这种优势就是指中国相对来讲具有可以更快地采用世界上更为先进的新技术的能力。

从外部来看，中国的改革刚好遇上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这一轮全球化的第一个特征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全球贸易环境，当然这都得益于“二战”后多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西太平洋地区的单边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关税和其他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大幅度削减。本轮全球化的第二项特征是快速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这种结构调整主要是为了应对迅猛发展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跨国流动。此次全球化的第三个特征则是交通运输、通信以及信息管理技术的显著进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由此，国际市场为中国提供了机遇（当然还有风险），而这种机遇远远超过了日本和韩国在其经济爆发式增长时所面对的机遇”（Brandt 和 Rawski, 2008: 13）。

在未来的 20 年里，上面提到的这些有利条件有一些将会继续存在并继

续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有一些因素不会再像以往一样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显著贡献。如果中国想要沿着这条引人瞩目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之路继续走下去的话，就需要各方面作出调整以适应这些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变化，同时还要有技巧地应对一系列挑战。本书强调中国应深化诸如国内要素市场、汇率机制和医疗卫生体系等关键领域改革，这些改革与有效的政策实施通道的强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相结合将会有助于中国应对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无限劳动力供应时代的终结；如何在减少全球贸易不平衡的努力中担任一个具有建设性的角色；如何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能力以帮助它们在全球经济中进行竞争；如何更好地应对史无前例的人口迁移、城市化和不平等问题；以及在低碳增长已经成为唯一选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日益增长的能源和钢铁需求。

来自本书和其他地方的许多证据都显示出，中国已经到进入经济增长的转折点，或者更准确地来讲是一个“转折期”。这种转折是以过剩劳动力供给时代的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中的某些部门的工资快速增长为标志的。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其实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 30 年和较快的收入增长综合影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的结果，目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预示着老龄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同时预计劳动力供应增长率将会在 2020 年转为负数（Tyers 等，2009）。这种状况也预示着，当中国失去作为其以往经济增长的引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一比较优势以后，中国必须调整行业结构和贸易构成。为了顺利推进这种调整，通过教育来构建人力资本优势，利用创新来加速技术变革，以及通过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市场变革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都逐渐成为整个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往的经济增长是以一系列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粗放型增长为特征的，这种结构失衡包含大量的高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钢铁和能源强度（即每单位 GDP 的钢铁与能源消耗量）已经异常的高。全球在资源和能源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间取得平衡的压力急剧加大，此类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影响力也会更大（Garnaut 和 Song，2006）。面对这种挑战，中国需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更快向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领域和服务业转移，同时所有的生产领域采用更为节能和节省资源的新技术。在这方面，改革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机制，使得价格可以真正反映供给和需求间的平衡状态将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这样的价格改革将有助于扩大供给能力，同时激励节能和节省自然资源的技术的发展，促进自然资源替代品的使用以保护自然资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同时也是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需要更快地向低碳增长型经济转变以应对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问题。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的健康和福祉，同时也是为了在毁灭性的灾难发生之前大幅度削减全球碳排放这一目标顺利实现（Stern，2007；Garnaut，2008）。考虑到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工业化进程也尚未完成，巨大的地域差别又导致各地区间收入和工业发展水平的不同，中国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向一个低碳经济体发展转变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损失经济的发展速度，因为发展环境友好型的工业也可以为经济带来新的增长源。主要的挑战在于如何设定一个适当的体制，使得相关方，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股东们，都有足够的激励来作出必要的调整（Cai 和 Du，2008）。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有力地说明，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作出一些调整来巩固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的时候了（McKay 和 Song，2010）。

中国向低碳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过程中关键性的一环在于提高生产力。而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又在于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大量吸收、运用和提高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绿色技术，中国具有很大的潜力来改变经济产出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而为了确保发挥出这种潜力，政府应该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为具有活力的私人部门积极参与这项事业提供便利。通过各界的共同努力来研发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并使之商业化同样可以使中国加快工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改变目前的工业化进程的轨道。

中国经济增长策略的另一个特征是增长严重依赖于出口和投资。而这进一步导致了最近几十年全球经济不均衡程度的上升，也引发了中国国内大量结构性问题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选择的方法并不多，目前一个广泛的共识是，中国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和生产力的提升来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虽然拉动国内消费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同样有一些可供选择的改革措施可以从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Song 等人（即将发表）就提出，通过给予农民工城市居留权来加快这些移民工人城市化的步伐就是一项拉动内需的有效方式，因为据估计中国这类工人目前约有 1.6 亿，而给予他们城市居留权可以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而这项特殊任务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与劳动力流动性和社会保障体系有关的制度改革来实现。当然，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随着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转折期，人们工资收入的增长很自然地会导致国内消费的提高，而且很可能其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要大于任何其他的制度变革的作用。高消费还会拉动中国的

进口需求，从而使中国为全球经济的更均衡增长作出贡献，并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可持续的引擎。此外，中国的汇率体制和土地管理制度的变革在解决一系列不均衡问题的过程中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策略存在问题，这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低消费只是其中之一，这些问题都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策略需要调整。例如，世界银行（2009）发现，过去一些年，经济增长在削减贫困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均、不断扩大的地区间的发展不均衡、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获取中的不公平都是过去一些年快速的经济增长所引发的副作用。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会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继而成为接下来几十年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大障碍。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折期会使收入不均的状况有所减缓，但是需要我們做的事还有很多。除了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和创建一个更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为了在保持生产力和人民收入继续增长的同时缩小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实行进一步的改革以促进城乡间的融合将成为至关重要的一步。而如果政府追求的目标是更为合理的经济发展的话，那么通过对现行的地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体系进行改革，并发展公共卫生体系来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也就非常有必要了。

最后，如果不考虑计算方式差异的话，到 2030 年，中国很有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Maddison, 2001）。中国成长为全球经济中的一个强大的力量将会使自身在一系列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无论中国本身是否想要这些责任。因此人们会期望中国通过与全球体系中的其他各方相互合作来为世界的稳定、进步和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在战略上与中国密切相关并需要中国参与的事项主要有：降低全球经济失衡、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在 WTO 框架内推进多边贸易谈判、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以及削减全球贫困等。在所有这些领域之中，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中国如何管理自己的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还涉及中国如何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在以往 30 年的改革和转型过程中，中国在改革自己的制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又为中国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继续深化制度变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要未来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继续存在，我们就有理由保持乐观，因为“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制度就会越来越多地向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改变，并因此强化推动经济增长的各项力量”（Lewis, 1955）。过去 30 年中国的经验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随着中国开始奉行一种新的、不仅追求效率同时也强调可持续性和公平

性的经济增长模式，接下来 20 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很可能将会面对比以往更多的挑战。实际上，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要面对的第一项挑战就是如何成功地向这一新的增长模式转变。而为了成功实现这个转变，中国必须要解决一系列尚未完成的任务，包括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从而完成向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经济、政府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和政治领域实施更为全面的制度改革。如果这些任务都取得成功的话，接下来的 20 年我们将会见证中国上升成为全球的领导者，或者至少也是与美国一起成为全球的领导者。但是成功想起来容易，真正实现却很难。中国平稳地上升到全球第一的位置需要改变许多现状，而本书接下来的每一章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

本书的第一部分着重研究中国的长期发展趋势和问题，这部分始于第二章 Ross Garnaut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期的分析。Garnaut 在 Arthur Lewis 的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劳动力过剩时代结束的时期及以后的转变打下了基础。他仔细思考了 2006 年的“中国经济前沿”报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的有关章节，该书提供了早期的、部分的证据证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的转折期。而此处又总结了近期的一些证据说明中国正在更果断、更深入地进入这个转折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从 2004 年以来实际工资的快速上涨。Garnaut 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经济的灵活性、对外贸易、投资和思想的开放性、人力资源的质量，以及与将要出现的更复杂的经济体相适应的监管体系。Garnaut 认为，通过经济的灵活性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在通过“刘易斯转折期”（Lewis turning period）的时候并不必然会减速。

很多人认为中国渐进式的、逐步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更为可取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这一点在许多关于“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对比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北京共识”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专制的政府严重干涉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发展模式，而“华盛顿共识”则是指需要相对较快地转变为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适用的发展模式。姚洋（第三章）分析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并对这些看法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非常符合“华盛顿共识”，而且“中国模式”是一种向新古典主义观点靠近的进程。姚洋将中国政府描述为在中国国内的各种社会团体之中仍然能够保持公正无私的政府，没有被排他的利益集团所俘

获。相对于专制主义来说，这种公正无私使得那些促进发展的政策成为可能，虽然这些政策在制造出受益者的同时也制造出了输家，但是却在过去 30 年里提高了全体国民的生活标准。尽管中国模式到今天为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姚洋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需要更清晰的政治改革和深入的民主化，以此来抵消一些怀有不同目标的强力的利益集团的形成。

姚洋认为民主化在未来是平衡政府行为和公众利益的一种方式，而张永生（第四章）则认为民主化是建立有效的中央 -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方式，而这种关系的演化发展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张永生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来分析政府间的关系，这种框架基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尺度——人员与财政，这两个尺度每一个都可以是“自上而下”的或者“自下而上”的。这样就可以将世界上大部分政府间关系归为四种可能的结构。张永生认为，大部分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都符合第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是自下而上的人员关系和自上而下的财政关系的结合。改革时期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则被描述为由第三种结构（自上而下的人际关系和自上而下的财政关系）向第四种结构（自上而下的人员关系和自下而上的财政关系）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由 1978 ~ 1994 年间的财政分权政策导致，而在 1994 年税收改革之后，中国又开始回归到第三种结构。张永生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中央 - 地方间的关系最可能的一种结果依然是自上而下的人际关系和自上而下的财政关系（第三种结构），而地方 - 中央间的关系则是自下而上的人员关系和自上而下的财政关系（第一种结构）。为了成功地在所有级别的政府间关系上进化为第一种结构，张永生认为有两个因素不可或缺：加强法律的作用、深化草根阶级的民主化。但是，正像中国许多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张永生清楚地指出，这种进程将会是渐进的，而且肯定会有一些中国特色。

Huw McKay、盛誉和宋立刚（第五章）则将经济发展和钢铁消耗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并通过考察整个工业化进程历史上有关国家的经验来研究中国未来对钢铁需求的状况。这一章明确证实了钢铁业的库兹涅茨倒 U 形曲线（KCS）的存在，并确认了关于钢铁单位消耗量的综合观点——技术的跃进和不断进化的消费者偏好都对钢铁单位消耗量的高低有决定性的作用。他们采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显示，当中国的人均 GDP 超过 15000 美元的时候，中国将会达到自己的 KCS 曲线的转折点，目前普遍预测这一水平大约会在 2024 年达到。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随着中国向高收入水平迈进，

中国不太可能沿着以极高的钢铁单位消耗量为特点的韩国模式前进。因为中国将不得不改变目前过于依赖重工业、投资和出口的发展模式。因此，他们预计，在钢铁单位消耗量的路径上，中国的发展模式最终将会融合北美、独联体、西欧、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各自经验中的某些方面。

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对于全球和本国的环境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中国的领导人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在发展计划中更多地体现出与气候变化作斗争的决心，而根据张中祥（第六章）的说法，中国的领导人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一点最先也最好地体现在中国提出了到 2020 年将减少 40% ~ 45% 的碳排放量，这个目标远远高于惯例。张中祥指出，提出一个伟大的目标是一回事，而达到这个目标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个前提下，他也承认中国的能源和 GDP 数据匮乏并缺少可靠性会使人们很难评定所取得的进步，当然也会引发可信性问题。此外，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目标上的冲突也会抵消而非支持中央层面的环境目标的实现。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张中祥也提供了许多详尽的证据表明迄今为止中国在能源保护和碳减排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达成自己的环境目标的可能性有赖于加强目前的政策，摆脱高能耗、高污染、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而且需要地方政府的合作。

Jane Golley（第七章）则研究了一个令中国领导者头痛了几千年的问题——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现在这届政府设立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目标——到 2050 年“大幅度缩小”西部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这个其他地区主要是指东部，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部分发生于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时期更是如此。Golley 分析了各省 2000 ~ 2007 年间的工业增长率，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尽管东部在中国的工业产出中仍然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虽然 Golley 提出了一些乐观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原因说明一些产业可能在接下来的 20 年扩展到西部地区去，但是有关平衡发展的各项证据还是表明这仅能在很小程度上降低地区间的发展不均衡。对于中国来说，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降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仍将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

本书的第二部分转向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和机遇。肖耿（第八章）、Rod Tyers 和张莹（第九章）对争论持续不断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两章都是以关注人民币升值压力为开端，这种关注主要依据巴拉萨 - 萨缪尔森假说（BSH）。该假说认为，在一个正经历

可贸易品部门生产力迅速提升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与此同时工资和非贸易品价格也在提高，该国很可能会出现实际汇率升值的情况。聚焦于全球的不平衡问题，肖耿认为，中国仍然不愿意让人民币升值，中国可能会考虑其他诸如私有化和减少管制等替代政策来降低私人部门的过度储蓄，并采取措施增加国内消费。接下来，肖耿的研究转向其认为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关键因素——低成本的资金。他认为成本很低的资金导致了全球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泡沫，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而且低息资本对于拉低中国的产品价格作用显著（因此也就使得实际汇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肖耿认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需要提高利率并改进资本管理机制，以确保资本流入国内或者国际更有效率的投资之中，而非流向投机或无效投资中。肖耿最后指出，未来中国国内物价的提高会促进实际汇率升值，当然前提是中国可以容忍升值。这一过程越快发生，来自外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就会越快得到缓解。

Tyers 和张莹进一步研究了中国一段时间以来的实际汇率变动过程。他们注意到，尽管很早就存在巴拉萨 - 萨缪尔森效应的期待，但中国的实际汇率一直到 2004 年才出现升值的趋势。从那时开始，实际汇率开始大幅度升值，而这又促使农业部门的价格和工资开始上升，并延缓了贸易改革的步伐。接下来他们又仔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制定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不能像评论家们所建议的那样实行完全自由波动。他们还认为，无论来自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的压力是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还是通过限制出口使人民币升值，其对中国和世界的整体利益都是有害的。这一章和肖耿的研究都揭示了理解中国过渡期经济的特殊性是很重要的，这一话题也是当今最热的一个话题。

陈春来（第十章）阐述的是另一个问题：中国最近几十年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取得的巨大的成功是否以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损失为前提。他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 1992 ~ 2008 年间中国吸引 FDI 的“中国效应”对其他 12 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结果显示，通常所说的对于中国在吸引 FDI 方面的主导地位的恐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特别是，陈春来发现进入中国的 FDI 增加与进入其他亚洲经济体的 FDI 增加是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的。他将所分析的时间段中存在的这种投资创造效应归因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长和亚洲地区内的产业网络活动。考虑到亚洲地区的进一步融合以及对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预期，陈春来预测这种正向的联系很可能在未来的 20 年里进

进一步加强。而且，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财富的增长，其他的亚洲经济体不仅会成为吸引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新目的地，而且也会成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外投资可以选择的目的地。对于发展中的亚洲来说，至少平均来讲，中国在吸引 FDI 方面的成功会是一个双赢或多赢的结果。

Prema-chandra Athukorala 和 Archanun Kohpaiboon（第十一章）检验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在危机前的贸易模式背景下是如何应对出口方面的压力的。这种分析主要源自于“脱钩”理论，这种理论假设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而且有能力独立于工业化世界的情况而保持活力。通过检验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内部相互之间和对外的贸易份额的变化，Athukorala 和 Kohpaiboon 否定了这一假设。通过强调将要素和最终产品包含在贸易流分析中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全球生产分工的不断增长实际上强化而非弱化了东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他们指出，即便乐观地来看，全球经济在中期也将只是部分复苏，所以我们需要一种一体化的东亚政策回应，从单纯注重出口回到均衡增长，强调国内市场。对于中国更是如此。他们的发现提醒我们要防止以反对对外贸易开放来实现均衡增长的政策出现，同时他们的研究也提出了要承诺在长期内实现非歧视性的多边和单边贸易自由化。

在全球金融危机对于城乡融合的影响方面，孔涛、孟欣和张丹丹（第十二章）有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发现。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在 2008 年下半年的出口订单急剧减少，人们一般认为受到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城市中的农民工——无论是雇用量还是工资都会减少，确实有几百万被解雇的农民工丢了工作并对关闭的工厂提出了抗议。但是通过“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城乡融合项目”对城市里的农村移民和农村家庭的样本调查，她们发现，2008 ~ 2009 年间雇佣人数方面只发生了很小的变化，而且城市中的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下降。相反，她们发现实际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因为 2009 年几乎有 1500 万农民工由城市回到了农村，其中 80% 回到农村的农业产业中。因此，是农业部门为回归的农村人提供了有效的缓冲，也为原本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农民工提供了缓冲，因为这部分人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影响。尽管这些证据表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这些城市中的农民工的收入相对来说令人惊奇地有正向变化，她们还是指出，农业部门未来不可能继续提供这样的缓冲作用，因此移民工作方面的冲击在未来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保障农村土地的财产权被看做是关键解决方式。

本书的第三部分着重于“政策和改革：未完成任务”。该部分以胡永泰（第十三章）的文章开始，他将中国经济描述为一辆正在加速的汽车，其面临着三种潜在的失败风险。财政弱化和生产力增长速度减缓被认为是两个潜在的“硬件故障”，是主要的经济机制的故障；管理方式上的瑕疵则关系到乘车人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问题，这是潜在的“软件故障”；而严重的环境恶化被看做自然的或外在施加的限制，而“能源供给故障”则会使车撞到墙上。在揭示了为什么这些特定的风险或失败都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之后，胡永泰提出了一个避免遭遇这些问题或中国在走向繁荣之路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其他障碍的改革议程表。他提出的避免遭遇“硬件问题”的方法包括培养更多新的企业家、根据未来的住房拥有情况推进城市化，以及发展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以使私人部门起到更大的作用。“软件改革”则是以政治改革为核心——采取自由选举机制、新闻出版自由以及独立的司法权。至于中国这辆车在“能源供应”方面的问题，其解决则有赖于中国有没有能力动员世界各国在全球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与合作。如果能够坚持这些措施，那么胡永泰的计划表将有望使中国在通往繁荣的崎岖之路上走得更加顺畅。

黄益平和王碧珺（第十四章）阐述了中国的结构不平衡问题的演化过程，并提出了一个总体的解决方式——要素市场改革。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中国的结构不平衡主要反映在 GDP 中的投资占比过高、经常项目盈余畸高、自然资源使用的低效率、收入差距较大以及环境恶化等方面，而结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渐进式的、逐步的经济改革使得产品市场已经完全自由化，而要素市场仍然是扭曲的。这导致劳动力、土地、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真实价格受到压制，作者认为这相当于向生产商、出口商和投资者提供了相当的补贴。虽然这在过去很明显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同样也增加了与不完整的改革相伴的结构风险，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些风险，将进一步威胁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的稳定性、平衡性和可持续性。黄益平和王碧珺认为中国的领导人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是很有限的，他们需要在政策上实现大的转变，并对要素市场进行一揽子的综合性改革。或许这些改革的某些部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但是只有在成功实施这些改革之后，中国才能真正完完全全地转变成为一个市场化经济体。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的所有方面几乎都显示出了“中国特色”，蔡昉和王美艳（第十五章）的研究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也不例外。这一章从展

示证明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证据开始，当然他们认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转折期”，而非一个时点，同时他们认为这个转折期开始于2004年。他们对于近期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趋势和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出现的变化调查显示，农业已经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储蓄池，而且农村工人向城市转移并定居于城市地区已经成为不可逆转和不可避免的趋势。结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主要争论在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抛弃“托达罗教条”（Todaro dogma）（该理论将二元经济体中的劳动力迁移描述为一种“有来有去”的模式，而非永久定居的模式）。这导致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控制甚至限制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政策，中国的户口体制就是一个实例。蔡昉和王美艳肯定了中国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户口制度改革，但是他们也指出，户口制度的缺陷导致农民转变成成为农民工但却难以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因此使得这一城市化进程带有了中国特色。进一步的户口制度改革将是至关重要的，这将有助于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农民变农民工”转变为“移民变城市居民”。

吴延瑞（第十六章）认为，内生性的创新对于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研究过去30年中国创新、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吴延瑞在企业层面上对中国的创新进行了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分析，然后考虑了中国在国际化背景下的表现。在展示了快速增加的促进创新方面的投资如何使创新性产出快速提高之后，吴延瑞接着指出，中国与世界上领先的创新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并质疑中国创新数量上的增长是否以创新质量的丧失为代价。根据上述分析，吴延瑞接下来给出了政策建议，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政策建议就是缩小中国与主要国家在创新方面的差距并提高创新质量，他在企业层面所做的分析显示出多种政策困境。具体来说，他的分析显示，相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私企来说，国有企业（SOEs）在研发的意愿和努力方面的表现要更好。吴延瑞指出，我们需要具体的政策措施来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创新，还应该改进法律体系并保护知识产权，从而确保未来私有化的进行不是以损失创新为代价。

最后，Ryan Manuel（第十七章）的研究着重于中国改革中引起许多不满的一个领域——医疗卫生体系。Manuel回顾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国在集体医疗时期（1950~1979）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花小钱办大事”的水平来说，当时中国的公共医疗体系是世界领先的。而在后集体化时期（1980~2003），Manuel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变得不公

平、花费巨大并且低效率。从那时候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NCMS）的引进以及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运动的实施都使得更大规模的公共财政资金被注入卫生医疗体系之中。尽管投入大幅增加，Manuel 认为，除非中国政府可以有效地解决个人医疗服务提供者所面临的激励问题，同时解决政府在监督、合作、管理方面的缺失的问题，否则，未来 20 年中国的医疗改革中将继续出现更多问题。

（王之堂 译）

参考文献

1. Brandt, L. and Rawski, T. G. 2008,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L. Brandt and T. G.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pp. 1 – 26.
2. Cai, F. and Du, Y.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missions reduction in China: are incentives for low carbon growth compatible?', in L. Song and W. T. Woo (eds), *China's Dilemma: Economic growth,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ANU E Press an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Canberra and Washington, DC, pp. 226 – 42.
3. Cai, F. and Wang, D. 2005,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The China Boom and Its Discontents*,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pp. 34 – 52.
4. Garnaut, R. 2008, *Climate Change Review Repo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5. Garnaut, R. and Song, L. 2006, 'China's resources demand at the turning point',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pp. 276 – 93.
6. Lewis, W. A. 1955,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Unwin University Books, London.
7. McKay, H. and Song, L. 2010, 'China as a global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vol. 18, no. 1 (February), pp. 1 – 32.
8. Maddison, A.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9.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2007,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7*, China Statistics Press, Beijing.
10. Song, L., Wu, J. and Zhang, Y. (forthcoming), 'Urbanis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XXXI, no. 3 (August).
11. Stern, N. 2007,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12. Thirlwall, A. P. 2006,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13. Tyers, R. , Golley, J. and Bain, I. 2009, ‘ Projecte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dia: the role of demographic change’ , *From Growth to Convergence: Asia’s next two decades*, Palgrave, London.
14. World Bank 2009, *From Poor Areas to Poor People: China’s evolving poverty reduction agenda, an assessment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March,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